

交互对象化：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

曾晨妤，张力生

摘要：“离开”是田野调查的必要环节，但相关的方法论探讨尚显不足，由此使田野调查的基本内涵不够全面。离开田野，指田野工作者在收集一定资料后从某处田野地点暂时或永久撤离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产生离开念头、解开离别顾虑、结束研究关系、铺垫写作基础。随着从田野世界中步步浅出，田野工作者进入一种“时空束结”的状态，在时空与身心两方面经受独特体验，以免陷入无法跳出“局内”细节的田野调查谬误。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他者”与“自我”之研究主体间的“交互对象化”，从而为阐释“局内”客观事实、反思自身理论预设提供时空条件。在“田野调查何以阐释社会事实”的后现代之争论下，当代田野调查的重点或许在于情境性而非全局性的事实阐述，尤其是进一步引发研究主体之间的反身共情，从而开启人类社群之间相互理解与共同协作的可能。

关键词：离开田野；方法论；交互对象化；时空束结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5）05—0143—10

一、天下没有不散的田野

田野工作者（fieldworker）也许未曾想过要“离开学术界”（leaving academia）^①，但应该都曾经从田野地点（field site）中离开过。离开田野（leaving fieldwork）是田野调查的一个必要环节，指田野工作者在收集一定资料后从某处田野地点暂时或永久撤离的过程。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议题，离开田野常常被误解成一件易事而遭到简化与忽略。无论是在实质作品亦或是在方法教材中，有关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都缺乏系统性的阐述，也并未受到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

这种方法论缺失至少带来三种影响：一是田野调查的狭隘化，即容易使研究者陷入“田野调查等于进入田野参与观察”的认知藩篱，而这已然成为趋势^②。二是离开田野的简单化，即误以为“离开”是理所当然会顺利完成的事情。三是田野调查的不可持续化，即忽视了离开田野之后的研究关系维持与事实核查（fact-checking）。在此背景下，田野工作者没有获得系统性的方法论指导，只好凭借直觉习惯行事，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体田野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本文以“离开田野”为研究对象，回答“如何离开田野”的研究问题，具体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离开田野的含义及其方法论意义是什么；其次，离开田野的基本过程及其具体工作有哪些；最后，关于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如何有助于重新思考当代田野调查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作者简介：曾晨妤，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研究。

张力生，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物质文化、博物馆人类学研究。

① Christopher L. Catherine. (2020). *Leaving Academia: A Practical Gui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美]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误用及解决之道》，高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出入田野本质是主客体转换的过程，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田野工作者与局内人（insider）之研究主体间的交互对象化（inter-objectivation），从而基于田野资料实现社会事实阐释、生活世界意义共享的田野调查旨趣。这种对象化有两层含义，即他者的对象化（the objectivation of others）与自我的对象化（the objectivation of self）。一方面，离开田野意味着田野工作者能够更加超然地处理田野资料，通过将局内人的他者对象化来相对客观地理解局内生活世界的意义；另一方面，离开田野也为田野工作者的自我对象化提供了时空条件，能够反思其自身未加言明的理论预设与价值判断。

由于“离开田野”属于时空性议题，笔者将通过时空束结（spatial-temporal knotting）这一概念来说明田野工作者在时空与身心两方面的独特体验，通过这样一种时空束结式的离开，田野工作者得以复归学术世界、投入文献工作，避免田野调查谬误（fieldwork fallacy），从而在更大的时代背景（background）中去把握田野资料的细节情境（context）。笔者也将介绍从田野地点“步步浅出”的过程及其任务与挑战，包括四个步骤：产生离开的念头、解开离去的顾虑、确定离开的方式、铺垫写作的基础。

对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旨在重新理解当代的田野调查。针对何为事实、何以阐释事实的后现代思潮，本文认为事实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而当代田野调查的重点在于情境性而非全局性的事实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引发主体间的反身共情，开启人类社群之相互理解与协作的可能。通过明确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本文试图推动社会研究的范式创新，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当代田野调查的基本内涵。

二、离开田野的语义：交互对象化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过程

本文所指的田野调查（fieldwork），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常常被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所使用，指通过切身的共在实现与局内人之生活世界的意义共享来研究特定田野地点的社会运作方式。就工作过程而言，田野调查可被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进入、扎根与离开（见表1）。

表1 田野调查的基本过程

工作顺序	关键任务	主要挑战
进入田野	获准进入并打开局面	如何寻找“守门人”
扎根田野	获取信任与建立友谊	如何维系研究主体关系
离开田野	关系结束与事实核查	如何妥善离开并留下好印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多数实质作品中，田野工作者热衷于对“如何进入田野”展开方法论反思。这种反思包含了一种步步深入的时间叙事，即自己作为局外人（outsider）如何找到守门人（gatekeeper）并小心翼翼地寻求局内人的接纳。通过该叙事，一种“进入感”油然而生，引导读者共同走进局内人的生活世界。

进入田野之后，田野工作者需要在田野里扎根下来，其关键任务是获取局内人信任、恰当地建立起友谊，而主要挑战是如何维系好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扎根田野的办法常常被简单概括为“同吃、同住、同劳动”，比如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在研究科纳维尔意大利黑帮时，通过居住在守门人家中来逐步打开局面^①。与“进入感”一样，扎根阶段的“在场感”促使研究者身临其境，并为田野资料的信度作了铺垫。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和资料收集的饱和，“离开”便成为一项必要且亟待完成的任务，其关键任务是如何结束研究关系并及时进行事实核查^②，而主要的挑战则是如何妥善地离开并留下相对较好的印象，以便后续的零星回访或是重新进入田野。但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既有文献关于“离场”的描述与反思显

① 参见[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② Steven Lubet. (2018). *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 Why Evidence Ma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28.

得简略且仓促，这种“一步离场”之感与“步步深入”^①的主流关切形成强烈反差。

总体而言，“田野调查=进入田野”似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固有印象。当研究者们分享自身的田野调查时，大多关涉田野的地点及进入情况，而较少谈论作为必要环节的离开田野过程。当然，这也跟目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本呈现与学科训练有关。当我们翻阅各种方法类教材书或实质作品，几乎未曾发现作者像书写“如何进入田野”那样，针对“如何离开田野”而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即便学者们提及了离开田野的相关内容，也更多地将其置于研究伦理的讨论中，而未能揭示离开田野的具体步骤及其方法论意义。

（二）离开田野与时空束结

如上文指出，离开田野是田野工作者在收集一定资料后从某处田野地点暂时或永久撤离的过程。作为一种必要的告别，离开田野是通过时空束结（time-space knotting）实现交互对象化进而获得反思性知识的前提。时空束结，是田野工作者（即将）离开田野地点时的一种时空状态，也是一种能够将田野资料凝固下来的完成时态。伴随这一状态，田野工作者会在时间与空间、身体与心理两方面产生出在单一时空内所经受不到的体验。

首先，离开田野意味着田野工作者从田野世界中抽离出来，复归到进入田野之前的学术世界中。但这种时空状态切换并不总是顺遂称心的，往往伴随着时间节奏的混乱和对空间秩序的敏感。在《在逃》（*On the Run*）一书中，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曾提到自己一边跟踪“第六街区”的黑帮枪击案，一边在学校完成课业，以至于很难从田野地的紧急状况中抽离。她甚至忘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工作，比如跟高校教授约定好了的研讨会等。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出学术生活”，“不仅对于时间和义务的理解改变了”，连“记忆也在变化”。同时，长时间生活在黑人群体中使得爱丽丝难以回到原本的学术世界，她时常会跟许多报道人（informant）那样惧怕看到白人男性，也会因为突然而至的响声（比如气球爆裂和锅具掉落）、快速接近的肢体动作而感到惊慌失措。^②

其次，离开田野也意味着田野工作者要直面身体习惯与身份认同的变化。在《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中，怀特为了融入波士顿的“诺顿帮”，开始学习帮派成员常用的脏话，并且试着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研究对象默许了怀特的存在，也未强求怀特完全地融入，但怀特仍然感觉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街角生活的影响：

当约翰·霍华德第一次从哈佛大学来找我，和我一起研究科纳维尔时，他就注意到我在科纳维尔的言谈与我在哈佛大学时大不相同。这并不是由于我使用了下流的词句，也不是因为我讲话时常爱不合语法。我讲话时似乎很自然，然而在科纳维尔很自然的事在哈佛大学就不自然了。^③

同样，爱丽丝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研究生之后逐渐意识到：

我觉得那些学生和富有的城里人的说话方式很奇怪，身体动作也让我难以理解。他们听起来怪怪的，说的笑话我也听不明白。在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社区里，你会感到不自在。而在人们将你当作他们中的一分子时你还感到不自在，那便是另外一种感觉了。^④

爱丽丝感到自己的性和性别认同发生了实质性混淆。一方面，爱丽丝在与黑人青年待上6年之后，感觉自己仿佛是无性别似的，甚至会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女性模样感到吃惊。另一方面，她也会像“第六街区”黑人青年消磨时间的方式那样，打量着每一位经过眼前的女性。不堪其扰的爱丽丝多次选择暂时性地离开田野，她谈道：“一小时左右的车程使我远离了第六街区的嘈杂和纷扰，也让我有机会去思考我的所

① David M. Fetterman. (2010).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3r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Inc.

② 参见[美]爱丽丝·戈夫曼：《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赵旭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③ [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第342页。

④ [美]爱丽丝·戈夫曼：《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第343—344页。

见所闻。”^①

如果把田野世界与学术世界视作两条平行的绳子，那么当田野工作者离开田野之际，这两条绳子便会收束为纪念性的时空结点，而田野工作者在时空、身心两方面的体验则是这些结点的具象表现。伴随着时空的束结，田野工作者能够避免陷入无尽绵延的意识流与实践流中，从而展开对他者与自我的对象化反思。

（三）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

相比于进入或扎根田野而言，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也许有些学者会认为，这样一种讨论对于田野调查及其文本呈现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在笔者看来，离开田野更像是一种不被看见（invisible）的“幕后工作”，其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作用往往被低估了。作为田野调查的必要环节，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田野工作者与局内人之研究主体间的交互对象化，这是获得反思性知识以实现意义共享之田野调查目的的前提。

出入田野本质是一个主客体转换的过程。在进入田野之际，田野工作者作为一个“局外”的主体，将田野世界及其人物视为一处有待被观察的客体。随后，田野工作者进入“局内”成为了客体的一部分，获得主位观（emic perspective）^②即“局内人”的事实观。在离开田野之后，田野工作者重新回到学术世界，成为“局外”的主体，并将自身及其田野资料加以客体化（objectify）而生成客位观（etic perspective）。在此意义上，离开田野作为一个主客体转换的过程，亦促成了交互对象化的过程。

交互对象化的第一层含义，是田野工作者将他者加以对象化，即“我如何理解田野中的他们”。一方面，“离开田野”为资料分析提供了时空条件，从而有助于田野工作者沉静下来、进行价值中立的事实阐释。另一方面，离开田野时的态度也是对待局内人的态度，这往往涉及研究主体间关系的伦理议题。在不少作品的方法描述中，田野工作者通常会与报道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谊关系，并在离开之际感到些许不适或混乱——这种“离场感”能够为研究观点提供较高的说服力，因为它体现了田野工作者深入田野的努力。相反，田野工作者如果表现出与局内人之间过多的情感纠缠——正如爱丽丝卷入一场复仇追凶事件那样，则可能会被质疑是否因个人偏好而歪曲了客观事实。因此，如果不对“离开田野”加以方法论反思，则难以判断田野工作者采取何种立场来理解局内人的生活世界。

交互对象化的第二层含义，是田野工作者对自我的对象化，即“我如何理解我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田野工作者常常将自己定位为“阐释者”（interpreter），并以田野调查作为阐释客观事实及其文化意义的一种科学方法，比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③。对自我的对象化，强调田野工作者的反身性思考，尽量规避以概念遮没事实的符号暴力——这正是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等学者所反思的^④。由于离开意味着田野资料被固定了下来，自我的对象化使得田野工作者意识到社会事实的不可全知性与多重阐释性，以免陷入对于事实阐释的盲目自信之中。同时，自我的对象化也有助于田野工作者与理论预设、价值判断保持距离，从而意识到其与局内人作为历史传统的产物同样受限于所属社群的意义之网。^⑤

离开田野所引发的这种自我对象化，亦有助于那些以自我或（准）家乡为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对自我民族志者（Auto-ethnographer）而言，离开田野也许不是肉身意义上的，因为他们往往以自我为研究对象而无法“离开”。同样，对于那些研究家乡^⑥或过去生活之地^⑦的田野工作者来说，早已建立的深厚

① [美]爱丽丝·戈夫曼：《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第346页。

② David M. Fetterman.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3rd edition), 21.

③ Clifford Geertz.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 New York: Basic Books.

④ 参见[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⑤ [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第152页。

⑥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⑦ 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关系纽带可能使得他们难以在情感上“离开”，获得客观的研究结论^①。针对这两种情况，田野工作者可以通过暂时悬置自我和他者、将自我对象化来寻求相对的价值中立，由此形成广义上的“离开田野”——尽管这一路径值得细说，但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可留待日后展开。

此外，本文对于离开田野的讨论更多置于线下（off line）的时空语境中，以此区别于网络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②等新兴方法。不过，笔者提出的时空束结、交互对象化概念也不失为“线上离开田野”（leaving fieldwork online）提供一种参考。

三、离开田野的过程：步步浅出

（一）离开的念头：“该离开了”

作为田野调查的一个必要环节，离开田野并非一个平淡简单的时空点，而有其“步步浅出”的过程（见表2）。

表2 离开田野的基本过程

具体工作	关键任务	主要挑战
产生离开的念头	追溯来源和弄清感受	如何进行反身性剖析
解开离去的顾虑	分析顾虑并检查进度	如何克服田野调查谬误
确定离开的方式	（暂时）结束研究关系	如何处理离开的伦理
铺垫写作的基础	资料分析与文本写作	如何进行客观事实核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产生离开念头是实际田野调查中常有的事情。在撰写研究计划或进入田野之初，田野工作者或多或少都需要做好离开的准备，比如拉比诺在摩洛哥村庄展开田野调查时，因担心自己深陷其中而难以离开，便计划配备私人汽车^③。对集体调研的田野工作者来说，离开田野往往与整个团队的行程安排紧密相关。相比之下，个体田野工作者需要更独立地面对可能产生离开念头的各种因素，比如难以解开研究困惑、不太愉快的田野遭遇^④，或有限的研究经费和时间。

每一位田野工作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都会产生不少困惑。对困惑的追问往往促使他们（暂时）从田野中离开，转而投身于文献工作之中。另一方面，田野调查并不总是顺利的，非预期的遭遇时有发生，比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遭到研究对象排斥（或不被需要），这往往也会催生离开田野的念头。唐·库里克（Don Kulick）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濒临消失的语言时，遭到了暴力事件。暴徒不仅夺去了他的财物和田野资料，还杀害了一位当地人邻居。库里克对此感到无助与愧疚，觉得“那个不幸是因我而起”。经过几番“离开还是留下”的内心挣扎后，他认为继续留下是没有意义的，最终选择离开田野地点。^⑤

其次，田野工作者常常背负着一种朴素的使命感，认为自己有必要花更多时间掌握局内细节，改善局内人的生活，因此容易沉浸于田野之中。一旦产生了离开的念头，田野工作者需要追溯该念头的产生来源，并试着弄清自己的真实感受——由此带来的难题是如何开始进行反身性剖析。最初是一种类似自我察觉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即在田野调查的间隙找出一段相对完整且不受干扰的时间（如访谈结束之后的当日晚上），认真对待那些近期常常闪现于脑海中的离开念头，思考这些念头是否归因于自己未能建立起与报道人的友谊，还是由于自己无法平衡好田野世界、学术世界与私人生活的关系。紧

① Edmund Leach. (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曾晨好：《数字民族志：数字化社会的意义共享——社会学的方法论反思》，《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

③ [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第104页。

④ [法]迪迪埃·法桑、[法]阿尔邦·班萨主编：《田野调查策略：民族志实践检验》，刘文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92页。

⑤ Don Kulick. (2019). *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How a Language and a Way of Life Came to an End in Papua New Guine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Algonquin Books: 198.

接着，田野工作者可以在几张 A4 大小的白纸上分两栏写下“离开”和“留下”的最真实感受——务必采用最为口语化的形式，比如“我想离开是因为消化不了大量的资料”，直至写出最为满意的答案。最后，田野工作者可以拿着这些白纸与值得信任的人进行交流，比如自己的导师、同侪或家人，以便从其他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客观把握田野调查的进展情况。

（二）离开的顾虑：“再等等”

产生了离开念头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离开。有的观点可能认为，离开田野未必是一件费劲的事，只需要跟大家打一声招呼便好。然而，田野地点并非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与进入田野一样，离开田野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考虑至少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资料收集的饱和程度。在进入田野之后，田野工作者通常会过渡到一个信息重叠性不断加强的阶段。换言之，当涉及特定议题时，不同报道人所表现出的神态与叙事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为了让田野资料达到基本饱和的状态，田野工作者需要继续扎根田野，反复询问不同报道人，直至问不出什么新的答案。此时，田野工作者可以考虑（暂时）离开田野地点稍作休息，或是进入下一个田野地点。不过在实际情况中，田野工作者依旧会带着“还不足够”的感觉，而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离去。就像爱丽丝写道：“一些人说，当你停止了解新的事物时，你应该停止研究的项目。我不确定事情是不是都那样。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达到一种‘饜足’的状态，从未感受到自己有足够的了解……”^①。

第二个因素是田野地点的二次可及性，即“我能否再次进入这个田野”。如前所述，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往往仰赖于守门人的背书，并随后通过获取信任、经营关系而顺利扎根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田野工作者能够“进出自如”。田野工作者需要判断自己是否与“局内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或是自己的存在能否有益于局内人（至少不至于损害对方的利益）。毕竟，并非所有的局内人都愿意接纳田野工作者的存在，或是愿意为后者提供一处暂时安身之地。尤其在政府、企业等工作场所中进行田野调查，办公室里的工位并不总是想坐就能坐下的。即使田野工作者能够给局内人带来价值，也有可能被其他更有价值的人替换掉。

考虑完以上两个因素，田野工作者接着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克服田野调查谬误。当田野工作者产生“该离开了”的念头，下一个问题往往是“够了吗”。实际上，田野工作者收集到的材料往往大于所需要的材料。尽管这些材料未必都用得上，但并不妨碍一种错觉的产生，即“我只要待得够久，就能弄清事实”。这种错觉可能是操作设计上的问题，比如缺少明确的研究问题，也可能归因于田野调查的投入程度，比如扎根时间太短、资料收集不够。无论是哪一种因素，这种错觉往往伴随着令人欲罢不能的“分离焦虑”，而无法让田野工作者意识到长期沉浸于田野可能存在的局限。或许，不离开田野的损失更大，而离开田野往往有助于学术灵感的产生。对此，田野工作者可以反身性剖析各种顾虑，通过田野日志来回顾初入田野时预期目标的达成情况。接着，可以初步建立一个资料收集清单，梳理出尚不明晰的信息，以便在正式离开之前尽可能收集完整。

在方法论层面，田野工作者也可以自行判断继续进行田野调查的必要性，比如重新思考拟定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关联程度，或是探索有助于回答拟定研究问题的其他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田野工作者常常坚信“只有田野调查才是最重要的资料收集方式”，但即使是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不完全意味着需要一头扎在田野里。正如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提出的民族志谬误（ethnography fallacy）^②——过于关注细节而看不见更广泛的影响因素，田野工作者也可能陷入田野调查谬误，即像是得了“近视眼”那般无法跳出眼前经验的盲域。从数据的效度出发，最重要的不是盲目推崇“越长越好”的田野理想主义，而是意识到每一个科学工具的条件性，由此寻找到有效解答自身研究问题的方法论。

^① [美] 爱丽丝·戈夫曼：《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第 283 页。

^② 参见 [美] 米切尔·邓奈尔：《人行道王国》，马景超、刘冉、王一凡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三）离开的方式：“怎样告别”

当田野工作者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田野，便需要思考如何妥善地告别。正如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感慨到“对一位田野工作者来说，难的不是出发，而是挥别”^①。在这一阶段，田野工作者可以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妥善地离去，并且给研究对象留下较好的印象，而其中的难点也在于研究关系的结束。

离开田野的方式可以是逐步退出的，也可以是突然离去的。社会学者陈向明给出的建议是：“逐步地离开现场，事先慢慢减少研究的密度，提前一段时间告诉有关人员自己将要离开，使对方有一定的心理准备。”^②这种心理准备同时也是留给田野工作者自己的，以便做好最后的资料收集工作。不过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库里克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临时承包一架直升飞机并当众离开，而他仅仅在前一晚才将宣布自己即将离去的消息，留下一群错愕不已的当地村民。^③如果田野工作者是受人欢迎的，则局内人会热情欢送其离开，就像怀特于1940年夏天离开田野时当地为其举办啤酒告别宴会那样。有条件的话，田野工作者还是可以好好考虑离开的方式，毕竟这将影响事实核查的后期工作。

与此同时，离开的方式往往有关“回报”的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在田野调查的语境里，研究者似乎总扮演着一个受益人的角色，而研究对象像是身陷符号暴力的被掠夺者，即平白无故提供信息让研究者拿去发表论文、申请教职。对此的方法论反思常常将“公正回报”作为田野工作者的一个伦理原则，这种回报可以是口头感谢，也可以是物质回馈——比如数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礼金，或是赠送纸质笔记本、精品文具等礼品^④。在离开田野之际，田野工作者也可以构想一下研究主体关系的未来维持方式，比如交换社交账号、寄送明信片、不定期回去探访，而不是“将研究对象当作橘子皮，吃完就扔掉”。

关于离开方式的伦理不仅指向研究对象，还关乎研究者自身。在正式告别之际，田野工作者也不要忘记几件事：一是不必过于担忧田野资料的收集程度，毕竟田野调查就像大海里拉起的渔网，总能捕到些有用的东西。二是做好“犯错”的准备，即使没有妥善地离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总结“离开”的经验，培养“再次进入”的能力。最后，田野工作者可以秉持一些田野乐观主义，相信自己总能善始善终地完成田野调查，即使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四）离开以后的事：“整理分析”

田野工作者成功地离开田野，相当于从田野地点的时空节奏中抽离出来，逐渐摆脱了时空束结的状态，并重新找回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控制权。此时，不妨做一些在田野无法做的或难以好好完成的事情，比如整顿一下心情、休息几天。

由于研究工作并未因离开田野而结束，田野工作者在适当休整之后需要铺垫好写作的基础，完成资料整理分析的后续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资料收集阶段就无法同步开展这项任务。理想地说，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一个彼此交叉、同步发生的过程，比如记录田野日志（fieldnote）、每周田野研讨也可以与资料收集同步进行^⑤——同步程度取决于资料收集的难度以及田野工作者的经验。但是，创造一种专门用于资料整理分析的时空状态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田野工作者试图离开田野的主要动因之一。它可以是数周或数月的一整段时间，只要能使田野工作者免受过多琐事干扰便足够了。对此，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写道：

在我离开“田野”之后，工作尚未结束。事实上这时我才刚开始进行将各种资料转录为文字档的“长期抗战”。……我开始爬梳这些资料，把照片和文字配对，也在早晚通勤或摇我刚出生的女儿入睡时，听一些我录下的实况。在正式动笔前，我把所有资料来回读了好几遍。我希望能在文字与影音中重

① [美]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胡昕译、郑焕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4页。

②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③ Don Kulick. *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How a Language and a Way of Life Came to an End in Papua New Guinea*. 197.

④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225页。

⑤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271页。

温现场，然后再尽我所能让事实在书中还原。^①

在沉浸式整理的过程中，田野工作者的记忆会不断闪回至田野世界中的各种细节，并将不同时空节点的田野资料串联起来，直至在显意识层面获得一系列顿悟式的学术灵感。

同时，田野工作者需要进行事实核查，以便做出符合事实的阐释，使其学术观点更有说服力。在资料整理分析时，可以采用“多方检验”（triangulation，即通过对比信息的来源来检验信息的品质）^②的方式来确保所收集资料的细节及其真实性，而非盲目地将那些“未经检验”的信息视为客观事实。倘若田野工作者在离开之际维系好了研究主体关系，便可以通过邮件、电话、社交软件等形式再度与报道人核实信息。同时，真诚勇敢地将文章初稿告知受访者，也不失为一个事实核查的办法，即根据对方的意见修正文稿中的相应内容，确保分析文本对客观事实的贴合，就像邓奈尔所做的那样：

在我向书中写到了的人物读稿的过程中，他们时常让我修正关于人物的具体日期和事件。如果不是本人或是他们的家庭，这些修正并不会被注意到。有的时候，这些改正对了解这一街区和邻里的人事关重要。如果一本书要对涉及任务诚实，那么修改这些地方就非常重要。^③

这种事实核查类似于陈向明所说的“参与者检验法”^④，即尽早将研究的初步结论返回给被研究者，根据对方的看法来有选择性地修改文本。若发现报道人改变了自己的原初说法，则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且有选择性地陈述在研究报告中，以便读者自行判断。可以说，事实核查也是一个交互对象化的过程，田野工作者不仅会将田野资料加以对象化，还会通过报道人的回应来客体化地审视自身所持有的先验立场。

当然，田野工作者也可以不必急于进入资料整理分析阶段，而是延伸地点^⑤或追踪已知线索^⑥，把田野地点挪到其他地方以便更好地理解原田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从而克服过于沉浸在局内细节的田野调查谬误。不过，即使是在离开一个田野点之后立刻奔赴下一个田野点，田野工作者最终也不得不结束所有的资料收集工作，进入资料整理与文本写作的环节。

四、当代田野调查：情境性阐释与反身共情

对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旨在重新理解当代田野调查。上文依次讨论了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和基本过程，接下来将从三个方面给出结尾的余论。

首先，离开田野的方法论反思是对田野调查之特性的再思考。本文突出了离开田野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探讨田野调查时不应忽视“离开”的必要环节——这亦是与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⑦的对话。就像人类学者对民族志性（ethnographic）展开了思考，即民族志与其他方法的区别之处是什么。从更宽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田野工作者可以思考的是什么才称得上是田野调查，以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有何本质差异。如上文提到，无论是进入、扎根还是离开，都构成了田野调查的基本过程与经验质感。相比起那些无需切身在场的资料收集方法，田野调查的特性在于它是“有进有出”的。倘若仅仅将田野调查的某一过程视作整个田野调查，不免会陷入一种简化的思维，即似乎只要进入或扎根田野就等于做了田野调查——而这恰恰是本文试图加以反思的。

其次，离开田野不仅意味着停止对社会事实的资料收集，还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方法论难题，即田野调查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社会事实的阐释。古典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

① [美]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第434页。

② David M. Fetterman.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3rd edition)*, 94.

③ [美]米切尔·邓奈尔：《人行道王国》，第440页。

④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405页。

⑤ [美]米切尔·邓奈尔：《人行道王国》，第426—427页。

⑥ 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⑦ Pierre Bourdieu & Loï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会事实是外在于个人的、具有普遍约束作用的客观事物。^①在田野调查的经典著作中，对客观事实及其文化意义的解析是十分重要的，如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库拉圈”（kula ring）的观察^②和格尔茨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③的理解。然而，一股解构田野调查的后现代思潮也随之兴起，这些学者消解了田野资料所呈现事实的客观性，要么认为报道人提供的信息只不过采用了田野工作者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④，要么指出田野工作者和局内人实际上都无法弄清生活世界的意义^⑤。其中，约翰·德里克·弗里曼（John Derek Freeman）强势批判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青年研究^⑥便是一个例子^⑦。不过，这一系列争论也推动了方法论的范式创新，比如怀特后来提出的“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⑧以及“将研究归还被调查人”^⑨的反馈方式。

反观本土学界，田野工作者对于社会事实阐释的基本看法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学者认为事实是可以被完整地把握的，提出要以大量的、反复的田野调查来实现经验饱和；另一类学者认为事实无法也无需被完整把握，更重要的是如何“编织”^⑩社会的图像；还有一类学者不强调所谓客观的社会事实，更关注社会事实在田野工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记^⑪。在笔者看来，倘若过于注重事实的全然可知性，容易使田野工作者陷入“面面俱到”的理想主义而难以从容地离开田野。倘若转向客观事实的虚无论或是过于强调主观真实（subjective reality），则可能引发田野工作者对于方法之科学性的普遍不自信，而难以推动方法论范式创新。

尤其在数字化时代，不仅社会事实变得扑朔迷离，对事实的阐释也更加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事实往往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正如涂尔干所言，我们无法脱离时空范畴去考虑事物。^⑫与其陷入无休止的解构，倒不如关注情境性阐释的可能，将社会事实置入具体时空情境之中（return social fact to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s）^⑬。同时，正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以过程方法论取径（processual approach）指出的：社会中的一切都在继续（keep going），无论个人还是社会过程都没有最终结果^⑭。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者无法断言自己的田野调查已然触及了所有事实，也难以断定基于自身田野资料的观点不会被修正。既然离开田野是必然的，而情境性而非全局性的事实阐释也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当代田野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就无需为此感到惴惴不安。毕竟，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由世代学者集体造就，而所谓的多重事实及其多重阐释需要被置入在长时段历史中加以甄别。

最后，对离开田野的探讨指向当代田野调查所可能引发的反身共情。田野调查既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常人生活状态的观察力。当研究者跳出关于社会事实阐释的学术争论，

① Emile Durkheim. (1982). *The Rules of Sociology Metho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②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③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④ [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8页。

⑤ James Ferguson. (1999). *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⑥ Margaret Mead.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W. Morrow & Company.

⑦ John Derek Freeman.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⑧ William Foote Whyte. (1989). Advanc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ociological Forum*, 4(3), 367-385.

⑨ [法]迪迪埃·法桑、[法]阿尔邦·班萨主编：《田野调查策略：民族志实践检验》，第191页。

⑩ 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社会》2016年第2期。

⑪ 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⑫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页。

⑬ Andrew Abbott. (1997).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 *Social Forces*, 75(4), 1149-1182.

⑭ Andrew Abbott. (2016). *Processual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放眼于田野工作者与局内人（乃至广大读者）都置身其中的鲜活的生活世界，或许更能回到田野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即在理解他者与自我之生活意义的基础上思考人类社会的主体共存。这并不是说详尽地阐述社会事实是不重要的，而是希望以此来引发主体间的情感共振。换言之，田野工作者通过切身在场感知了局内生活，在离开田野之后不仅客体化了局内人，也客体化了自己以及所属的社群，从而获得反思性知识。当田野工作者的这种反思性知识落为文本，或许将启发读者们意识到彼此作为个体的历史性与共通性，由此开启人类社群之间相互理解与共同协作的可能。

Inter-Objectivation: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Leaving Fieldwork

ZENG Chen-yu & ZHANG Li-s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Leaving” is a crucial yet understudied part of fieldwork, with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However, scholars hav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is aspect, resulting in a narrow definition of fieldwork. Leaving fieldwork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fieldwork gradually disengages,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after collecting data to a certain extent. As fieldworkers transit from the field back to the academic world, they will enter a state of “spatial-temporal knotting” to avoid the fieldwork fallacy of overemphasizing the “inside” context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distinct shifts at the spatial-temporal and physical-mental aspects.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eaving fieldwork is about the inter-objectivation between “other” and “self”, enabling fieldworkers to interpret objective realities within the field and reflect on their theoretical hypotheses. Under the post-modern debates on how fieldwork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social fact, contemporary fieldwork should prioritize contextual over totalizing interpretations and also focus more on reflexive empathy amo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fostering shared meaning across diverse communities.

Keywords: Leaving Fieldwork, Methodology, Inter-Objectivation, Spatial-Temporal Knotting

[责任编辑：赵蔚平、陈慧妮]